

财政制度与 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 历史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 编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研究/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2

ISBN 7-5005-8889-5

I. 财… II. ①中… ②中… III. 财政-经济史-中国-文集
IV. F8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2105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342 000 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ISBN 7-5005-8889-5/F·773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積古
國情
彩求
發創
展



乙酉年

許敬



序

许 毅

2004年7月，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成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促进了财政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作用的更好发挥，推动了财政史教学与研究的良性发展，为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2005年6月，财政史专业委员会理论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并积极发言探讨财政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为了更好地宣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会议主办方决定把各位代表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现在书稿马上就要付梓印刷了，相信该书的出版会给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史、财政史学界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无论是认识今天还是预知明天，首先要以了解昨天为基础。正如列宁谈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绝不在于简单地记录历史的变迁，而是为了通过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成败的回顾，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以便早日完成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并为实现马克思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消除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宏伟目标创造条件。

现在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的许多人对一百年来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悲哀。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中国在世界封建农耕经济的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历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先后出现过“文景之治”、“汉武帝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到了清朝前期,统治者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使农耕经济达到顶峰,出现了“康乾盛世”。然而,国家稳定和四海升平也为腐败创造了条件。乾隆后期疏于理政,宠信和珅,君臣二人把奢靡之风刮到了极致。在骄奢淫靡的社会风气下,各级官吏无所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从而导致整个统治机器的腐朽,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愈发尖锐,在政治方面表现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加。

清王朝逐步衰微之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不学习也不引进西方的技术,白白错失了赶超世界先进潮流的时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迅速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列强不断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只能一次次地战败赔款,赔款经费来源不足便借用外债,外债的偿还又成为沉重负担。为偿付赔款和外债,清政府不仅以盐税、关税、厘金作担保,还拼命增加捐税,这进一步丧失了国家主权与利权,招致广大民众的不满。如此恶性循环,清政府终于在社会危机与财政危机并发的时候土崩瓦解了。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始终没有摆脱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勤勉廉洁,励精图治,施政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足,逐渐沦入“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最终被赶下历史舞台这样一个周期性的怪圈,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国曾经有过飞跃,但是面对西方产业革命的洪流,中国封建统治者没有及时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从而失去了继续领先世界的机会,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摆脱了百年屈辱。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被封锁包围的条件下,在政治、经济、社会、国防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其内政外交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说,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行以“156项”和票证供应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经济完全是特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正是这些措施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客观基础。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面的26年。我们建国56年来的发展是连贯的,循序渐进的,前30年的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种随意割断历史,随意否定过去成就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20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消除

三大差别，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现在，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建设发展很快，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即陷入迟滞、徘徊的局面，农民增收也困难重重。这就要求我们以工业反哺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的目标。目前我国社会经济中小生产的比重仍然很大，农业领域小生产汪洋大海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这就表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相容的，必须对小生产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绝不是否定承包责任制，而是应当在此基础上根据生产力发展需要调整生产关系，通过按照市场交易规则实现土地经营权转承包的办法，来发展专业户、大户以及基地和公司的农业经营，来解放生产力。改造小生产不可能采取强制没收的办法，只能通过在生产经营领域联合的方式，以现有城镇为依托，变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规模化、现代化、集约化的大生产，变一家一户生产的只能上集市经营的农业小商品为有组织、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符合现代化国内外大市场要求的农业大商品，变因受小生产制约而相对贫困的农村生活为社会主义小康化的现代农村生活。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阶段性成就，正在朝着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战胜百年屈辱命运之后重新站立起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在21世纪一定可以完成复兴大业，步入一个全面的小康社会，并创造一个长盛不衰的和谐社会，重新以东方巨人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奋斗，社会主义制度也必将显现出愈加巨大的优越性，从而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贫穷和剥削，实现全人类共同解放的目标。

前 言

中国传统经济制度与思想的创制与演变，历来以治国理财为重心，财政分配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其制度与思想的精华大部分可归类于财政方面，因此，财政史的研究可较为全面地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更可以在当今经济学全面西化的趋势之下，找出更具有我国经济历史特色、更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经济指导性理论。财政学中的各种理论、现象，均植根于财政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财政史研究是对财政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揭示和科学总结，是财政学的理论源泉和研究基础，也是财政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对财政史进行充分的研究就不会产生准确、科学和富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理论。

通过中国财政史的研究，将使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如“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中国财政经济制度的深远影响、财政税收与政治经济的内在规律、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财政原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货币、会计等专门领域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市场化改革是足资借鉴的。而对这些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揭示和总结是以往的财政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

中国财政思想是人类经济思想宝库中的精品。近代，它与西方经济思想相互融合、相互修正，积极地促进着人类经济思想的进步和发展。当前在美国、日本、欧洲，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国财政史研究群落，其人数和学术成果的数量、质量均在我国之上。而我国自上个世纪30年代后对财政史的研究重视不够，致使财政史研究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和学术地位均较弱，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总结、继承和借鉴财政史提供的规律和经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财政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有抱负的学者和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财政史学科虽是史学研究的边缘性学科，却是我们财经专业的传统特色学科，它的发展与建设是关系财政学科长远发展的重要工程之一。加快、加强财政史学科建设，对提升财经专业学科的办学水平，增强学科特色，加快财税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中央财经大学在财政史研究方面一直具有较强的优势，曾有以崔敬伯、王子英等为代表的一批财政史学研究专家，为全国培养了一批财政史研究人才，出版、发表了数十部财政史专著、教材和论文。目前我们成立了“中国财政史研究所”。我们希望借承办中国财政史专业委员会 2005 年年会及赞助出版该年会论文集的契机，为财政史学的研究做出贡献，为进一步完善我校的财政学科做出最大努力。我们认为，加强对财政史研究方面的建设，也是我们高校对财政人才培养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财政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学习现代财政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学好中国财政史，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这将有利于其加深对财政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使其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如果我们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西方的财政理论与财政思想如数家珍，而对我们自己的财政理论与财政思想却知之甚少，那将是一种悲哀。因此，在当今的经济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再次加强对财政史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结、继承和借鉴财政史提供的规律和经验，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财政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有抱负的学者和管理者以及新一代的财政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众所周知，一门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是艰难的，但一门学科的没落和流失却是快速的。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全社会的学者、专家和各个财经院校，大力加强对财政史的学术研究，从而加快对财政史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专业设置，以期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更快更好地推动高校及我国的财政与经济理论的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马海涛

2005 年 11 月 16 日

目 录

重视历史教育 认识基本国情	许 毅 (1)
国民政府分税制税收划分研究与借鉴	叶振鹏 赵云旗 (10)
英国财政制度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历史考察	陈宝森 (35)
新中国外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普森 (47)
抗日根据地财经战线的历史功绩不可低估	赵秀山 (56)
传统改造与现代建构：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制度的两重趋向	孔永松 (64)
晚清财政改革与财权下移	马金华 (77)
古代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泰民安护航	王文素 (88)
财政民意、财政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叶 青 (97)
晚清官俸支出政策的嬗变	申学锋 (105)
重温秦皇汉武财政措施的功过得失	刘孝诚 (116)
民国时期遗产税的推行及其影响	刘燕明 (122)
中国古代人头税制度的社会价值评估	孙文学 (137)
西周财政体制初探	朱焕然 (149)
论漕运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齐海鹏 (159)
传统财税制度与现代财税制度的历史转折点	
——国民政府 20 年代末财政整理的历史意义初探	张劲涛 (17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管理的制度建设	张 侃 (180)
封建皇权专制的赋税之弊	李炜光 洪 钢 (19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收支规模的增长与结构变化	陈光焱 (205)
中外税收立法史考	郑 榕 (218)

建国初期及“一五”计划时期的财政体制调整经验分析	赵梦涵 (226)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财政的影响	黄天华 (234)
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刍议	潘国旗 (256)
附录 1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机构名单	(267)
附录 2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章程	(269)
附录 3 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专业委员会 2005 年理论研讨会综述	(272)

重视历史教育 认识基本国情

许 毅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有些人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认识不全面，对我国国情了解不深入，从而产生了照搬西方的倾向。忘记了中国悠久的五千年文化，忘记中国是一个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感触更深的是，不少人对近代中国的历史都一无所知，对一百年来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也搞不清楚，这是一种悲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国 56 年来，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逐步走向了世界，我们不再是闭关锁国、闭目塞听的封建帝国，而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我们摆脱了百年屈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永远不能忘记，这是历史学者的历史使命。

一、当前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深刻地指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民）之要务，为国家之要道。”这反映了史学对于国民和国家的重要性。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更是提倡国人“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增强民族的忧患意识。毋庸置疑，史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盛衰，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工作。当前全国人民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努力奋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因而在教育思想上出现了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倾向，加之历史教育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上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模糊的观念。有人通过简单对比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进而否定过去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道路。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

轨和与世界接轨并存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对这些思想领域内存在的混乱思维进行及时的清理,否则不利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无论是认识今天还是展望未来,首先要以认识昨天为基础。正如列宁谈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中国为什么在经过百年屈辱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回答这样一些根本的方向性的问题,就必须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出发,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中得出基本认识和经验总结,以此对我国当前的建设以及未来长远的发展规划起到积极的宏观导向作用。

但问题在于,就当前我们的历史教育而言,要真正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

高校历史系是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主力军,而今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陷入了招生难、学生就业难的困境之中。在各高校纷纷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许多历史系却缩小招生规模,还有不少大学将历史系改成旅游文化管理学系或开设旅游文化管理学专业,以图生存。高校历史教材也存在严重缺陷。1990年以来,史学界出版了大量历史学教材,各高等院校使用不同作者、不同版本的教材,有的甚至只使用自编的教材,排斥其他教材。就目前而言,值得一提的史学教材只有寥寥几种: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2版),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3版),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2版),潘润涵、林承节著《世界近代史》,王斯德、钱洪主编《世界当代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1995年修订本),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纲》(4版),李侃等编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4版),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2版)。作为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财政史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截至目前,学界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财政史教材有10多部,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到财政史的经济史著作。不可否认,这些教材对财政史学科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存在的问题我们也毋庸讳言。多数财政史教材实际上仅是财政制度史著作,从财政收支、财政制度变化等各个专项进行了阐述,平铺直叙偏多,深入论证与考察者较少,宏观研究更少,对于财政历史的发展规律罕有总结。

中学教育是国民文化教育的重要阶段,一个公民接受历史教育、了解祖国的历史主要在中学阶段,其人格的塑造也主要在这个阶段。正因为如此,当今的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史教育工作者特别关注中学历史教育的发展。然而, 目前我国的中学历史教育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 历史课程的教学不受重视, 历史课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副科”, 教师教学热情和学生积极性不高; 没有将历史教育与国情教育联系起来, 而是以灌输基本历史知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却要求学生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 这是不现实的。因此, 改革现今的历史教育势在必行。

二、从“康乾盛世”到百年屈辱

要认识中国的国情, 就必须追溯漫长的中国历史, 特别是封建社会达到巅峰的“康乾盛世”及其衰落过程。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古国, 其中封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占据了历史的很大比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历代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虽然其间存在着王朝更替和国家分裂, 但封建生产关系一直得以保留, 并保证了中国在世界封建农耕经济的发展历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先后出现过“文景之治”、“汉武帝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到了清朝前期, 统治者励精图治, 为维护国家安定, 促进经济发展, 缓和阶级矛盾, 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 从而使农耕经济达到顶峰。

清朝入关前即实行了八旗制度, 入关后又将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旗人平时生产, 战时出征, 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 而且还包含了征赋、刑罚及管辖旗人的财经政法等方面的职能, 军政、军民合一, 机构精简, 这为国家的统一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军事条件和政治条件。

在生产关系方面, 清初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 以发展农业经济。康熙五十一年(1712), 为减轻人民的丁银负担, 清廷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继位后, 又实行“摊丁入亩”办法, 将丁税银平均摊入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摊丁入亩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它结束了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 保证了清政府的钱粮收入, 在客观上改变了过去丁役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 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 清政府实行民族团结政策, 建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清朝统治者入关后, 为缓和满汉民族矛盾, 特别注意争取汉人的支持与合作。顺治元年(1644), 清廷大规模地开科取士, 增加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 把大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吸收到清朝政权中来。对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 清政府也采取争取团结的策略, 从而减少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在民族统一方面, 康熙帝先后发动了平定三藩、抗击沙俄、平定新疆的战争, 并统一了台湾。

乾隆时,清政府又粉碎了维族各城首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巩固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至此,国家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自入关统治至乾隆中叶,经过四代皇帝百余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出现了空前繁荣、统一、强盛的局面,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康乾盛世”。盛世景象反映在再生产领域的各个环节上。在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逐年增加,粮食产量也大幅度上升。与此同时,摊丁入地、永不加赋政策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条件,使农耕经济发展到了最高峰。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总人口为9000万左右。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已增至3.04亿,这个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内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也渐趋活跃。到乾隆末期,国内粮食、棉花、丝、茶、盐、瓷等的商品率都已很高,全国流通着约4亿两白银的商品,社会产品的商品率约为15%。工商业的繁荣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也促使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国库存储日渐丰厚。清代财政收入在顺治十七年(1660)仅2833万两,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国库存银已高达8182余万两。

然而,国家稳定和四海升平也为腐败创造了条件。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克顿曾经说过:“权力导致腐败,极度的权力导致极度的腐败。”腐败之所以能够发生,还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不但满足了腐败者贪婪的欲望,同时又助长了这种欲望无休止地增长。乾隆后期疏于理政,宠信和珅,君臣二人把清廷的奢靡贪腐之风刮到了极致。此外,乾隆还不顾经济条件大兴土木,修建园林,多次出游,挥霍无度,与康熙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王公贵族、封疆大吏等阶层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不但在内部争权夺利,而且面对丰富的社会财富,个人私欲迅速膨胀,在骄奢淫靡的社会风气下,无所忌惮地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从而导致整个统治机器的腐朽,影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愈发尖锐,这种矛盾反映到政治方面,表现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大量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以致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加。

正当清王朝日益奢侈腐败,一步步走向衰落腐朽时,西方国家却正发生着伟大的工业革命,英国、法国、德国等逐步强大起来。大机器生产的广泛推行使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了机器也就有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各国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政治权力,他们制定了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政策,为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西方的工业革命,使16世纪即已开始的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骤然加快,资产阶级纷纷走出国门,组织商船队和特许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

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血腥而又必需的原始积累。西方列强很快就把扩张目标对准了资源丰富、市场广大、政府腐败、技术落后的清王朝。

面对西方国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不学习也不引进西方的技术，对英国进贡的机器和工艺品不屑一顾，白白错失了赶超世界先进潮流的时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朝大国迅速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法、日等国不断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只能一次次地战败赔款，赔款经费来源不足便借用外债。外债的偿还又成为清政府的沉重负担，无力偿债便以盐税、关税、厘金作为抵押，这又进一步丧失了国家主权和利权，招致广大民众的不满，广大人民纷纷起义反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嘉、道中落后的清政府，经济与财政已经完全被腐败所摧毁，而作为军队主力的八旗子弟的腐败又摧毁了军队。八旗腐败、官吏四散，为了镇压起义，统治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举借更多的外债，为偿还外债便在国内进一步增加苛捐杂税。如此恶性循环，清政府终于在社会危机与财政危机并发的时候土崩瓦解了。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始终没有摆脱上层建筑在开国时勤勉廉洁，励精图治，施政符合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足，逐渐沦入“盛而骄，富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最终被赶下历史舞台这样一个周期性的怪圈，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曾经有过飞跃，但自宋元以后中国的生产技术就没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新的生产工具的研制也基本上停滞不前。随着一些政策的调整，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但是面对西方产业革命的洪流，中国封建统治者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没有及时引进先进的生产力，而失去了继续领先世界的机会。中国的农耕经济和西方的产业革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摆脱了百年屈辱。

三、建国以来的基本国情

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农民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把中国共产党从农村送到了城市，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执政党。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只有2900亿斤，而全国人口达5亿多，其中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90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进城是不可能的。那么，农业经济能否成为建立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制约，虽然在一定领域内已经拥有较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但广大

的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生产仍然处于小生产状态。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小生产的比重依然占国民经济的 80% 以上。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根本不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新中国政权。传统的农业经济不能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基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日本在华资本、美英在华资产的基础之上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除了国民党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资产外，中国大陆留下来的上述三种资产全部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再加上由苏联援建的 156 个工业项目，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中，少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军工等领域，其余多数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小生产，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被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所包围。因此建国之初的经济是建立在二元结构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权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中国特色的经济基础也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实现了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到“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转变。这个转变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当时复杂的、剧烈对抗的国际环境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结束中国的屈辱地位而英勇斗争的结果，它对于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新形象，对于新中国的稳定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体现。

在被包围封锁的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以加快工业化步伐。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经济上，通过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的重大举措，对经济环境进行了整顿，同时票证供应制度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经济秩序较为稳定；国际上，我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 156 个大的先进项目的援助。“一五”计划提前胜利完成，共实现投资 600 多亿元，这笔投资的经费主要来自工农业的剪刀差和在各行各业中实行的低工资政策，这部分原始积累完全来源于我们的自力更生。

1955 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我国争取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与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也团结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使我国得以逐步打破包围封锁，并于 1971 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了赢得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利局面，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也在紧张进行。1958 年，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元帅开始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1964 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1966 年 10 月，第一枚核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